

著者原序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在北卡羅林那大學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應威爾 (Weil) 氏捐資講學，後來擴充而成此書。講授的時候訂定以出版爲條件，但成書之期竟超過了我的約定，承蒙我的朋友格蘭亨姆校長 (President Graham) 允許展延，這是我所要感謝的。

我自知我的議論是悲觀的，牠所依據的一幅現狀圖畫是黑暗的。關於這點，我的議論本身已有解釋，我以爲毋須再有什麼解釋了。假如我能說服少數讀者認識深淵與我們相去之近——英國人通常是要到那個地步纔肯矚起考慮原則的——再或不然，假如批評家能夠表明我是誤解了現狀，我就感到滿意了。我達到我的結論，我是覺得扼腕的，而且是曾經長時期悉心研討了這些結論所依據的資料。我的結論倘若是另一個樣子，我該是快樂些，然而我有那不能推諉的義務，必須服從事實的驅使。

我深深感激我的同事畢爾斯 (H. L. Beales) 與斯墨里 (K. B. Smellie) 諸君，他們對於我所討論的題目，曾時時有所發揮；我又應該特別感謝哈滿德夫婦 (J. L. Hammond) 和湯萊教授 (Professor R. H. Tawuly)，因爲他們的著作使我得以看透民主政治下人民的不滿的一般問題。我須趕快說明對於我討論的題目，他們雖提示了這樣深湛和同情的一種瞭解，但他們概不負有什麼責任。

乙
571.5
5044

RW1400/13

至於本書的題獻，乃是對於無限的摯情，聯表微意。一九三一年我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住了幾個月，克拉克教務長（Dean Clark）和他在法學院及研究院的同事們使我了解研究學問如何是增進友誼之道。

目錄

著者原序	一
第一章 安全的幻想	一
第二章 代議制度的衰落	四四
第三章 資本主義民主政治中的權威與紀律	一〇五
第四章 革命的主張	一七二
第五章 結論	一九五

民主政治在危機中

第一章 安全的幻想

一

一七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吉斯德斐爾 (Chesterfield) 預言法蘭西大革命將要發生的名句，乃是無人不知的，他那天寫道：『我徵諸歷史，凡政府將發生大變與革命前常有的一切現象，在今日的法蘭西，都可看見，而且日增無已。』當年控制着法國命運的人，鮮有看到吉斯德斐爾指稱的朕兆，具着何等的意義。他們之憤憤於他們自己的命運，殊無以異於『清教徒之亂』 (the Puritan Rebellion) 爆發前夕那些英國人之欣然自慰，以為英格蘭的太平無事，人民盡忠，未有甚於是時者。(註一)然而，在這兩種局面裏，其間莫不表現有各種現象，指出制度方面不能不有那些在歷史上劃時代的最後斷然的調整。

我們這些目覩俄羅斯革命實驗的人，也許與我們的前輩一樣，容易小覷了這番實驗的意義。我們（譯者按係指英國人而言）與俄羅斯經濟情形的不同是很大的。我們的民族性格，我

們的歷史傳統，都促成了一種大相懸殊的進化。我們的行政機構並未腐化。我們的中等階級，雖曾遭受種種的損失，但依然健在，而且自信有力量。任何鼓吹革命的政黨，概未達到那種足以傾動選民耳目的重要程度。任何隸屬左派的重要政黨，概未明白地承認，說是願意脫離憲法程序的傳統路線。國家軍隊亦無背叛政府的表示。罷工雖然接一連二地發生，像英國且曾有一次總罷工，但並未遇到了不得的損失。一般工會在若干年來所處的地位，可說只有招架之力，並無還手之方；近年間工會一樁顯著的特色，便是會員人數的激減不已。此次經濟蕭條，固然險象環生，蔓延甚廣，爲空前所未有，但此次不景氣的造因已在化除之中。可惡的賠償制度是已經結束了。協約國間債務之一筆勾消已日見其爲不可避免之舉了。戰後那種不祥的經濟國家主義的風氣說不定已經過了牠的最高峯，盛極將衰了。國際匯兌方面已迅速發現一個適當的基礎，其發現的迅速，竟超過一九二八年經濟大變以前所能希冀的了。回溯拿破崙時代幾番血戰以後，歐洲蹂躪之餘，糜爛不堪，費了三十年功夫，纔得恢復元氣。由此言之，現世界大概也要經過一個相同的危機期間，纔能發現各種基礎，以建築一個新的平衡狀態。

誠如亞當斯密斯 (Adam Smith) 所言，一國之中有許多敗壞的地方；然而我們也無須否認任何社會制度天然具有恢復元氣的力量。但據我看來，一位精細的觀察者，若願意看個透澈的話，總不會盲目於我們周圍的種種症象，那些症象至少在過去，常是社會騷亂的先聲。我們周圍有的是貧富與強弱的懸殊；我們今日對於這些懸殊情形非常深惡痛絕，所以自從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那時候以來不大爲人說起的社會平等哲學，今日又重整旗鼓起來了。那些失勢的人表示了種種半自覺，但出自於心的抗議；這種抗議愈是無效，那些人愈是憤恨不平；從這方面說來，那次英國的總罷工，和美國加斯頓尼亞(Gastonia)與希梭(Heeren)兩地的總罷工，我們若愈加以慎重考慮，其意義亦愈見重要。對於人民憤懣不平所加的壓制，處處都是日漸澈底化起來。一九二七年的英國勞資爭議條例(the British Trades Disputes Act of 1927)是英國立法史上，自從一七九九年的結合條例(the Combination Acts of 1799)以來，第一次仇視工會的法律。美國勞資糾紛事件中，禁止騷擾命令的運用，雖未必如其贊助者或其反對者誇說的那樣重要，(註二)但其影響所及，殊不免使美國的勞工團體視法院爲資方爭取經濟權力之又一工具。(註三)英美兩國對於共產黨人的處置方法，以及特別在波蘭、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共產黨人所遭的慘遇，均足見各該國仇視言論自由之心，已達於嚴重的程度；而一個嚴厲地迫害人民的政府，總是一個感覺其自身基礎受到了威脅的政府。用暴力來解決政見的不同，(這一種習慣一部分無疑是由歐戰而轉劇烈的，)似乎已成爲我們一種心理，自一八四八年那些慘劇以來所未有。意大利與俄羅斯不過是一種過程中的最後表現，如今還有其他地方尚在這種過程遞嬗演變之中。

現在風靡世界的心理便是一種深刻與普遍的幻滅。我們這時代的人似乎已失掉價值的體系。準確性已爲玩世不恭的態度所代；希望已爲失望所替。藝術、文學、與音樂方面的種種運

動差不多已把過去許多偉大成就所由創造的那種傳統棄之如遺，而從抹殺此傳統整個意義的種種方式中尋取牠們的靈感；再不然，便像英國的伊里阿特（T. S. Eliot）與美國的喀德（Willa Cather）托庇於一種富於中古情調的哲學裏，這又是抹殺了晚近百年間種種發現所包含的經驗。世界大戰已經致命一拳，打倒了向來是人類行為之永久制裁的宗教信仰；那些教會彷彿成了舉行一種習俗相沿的儀式，而非左右人類信念的一種方法。三十年前，絕少有人覬議的那些制度——如英國的官立學校，美國商人形成該國文明的精神之權利——如今大遭抨擊，其被仇視之深，使牠們永遠處於自衛不暇的地位。講到我們各種欲望的全般性質，具見一種熱病似的急躁，一種肆無忌憚，一種欠缺鎮靜的樣子，這都顯出我們茫然不知人生應當追求些什麼東西。否定的精神實已駕乎肯定的精神之上了。

這些仍是言之未盡。我們的文明的基礎，遭着一種澈頭澈尾的抨擊批判，這是自從盧梭（Rousseau）震駭了十八世紀以還所未有的。我們的那些先知誠然沒有盧梭那樣偉大；但他們多數是猛烈地駁斥那現行秩序，而且浪漫地渴盼着一種新平衡的原則之出現，這又無以異於盧梭了。前輩中間的威爾斯（Wells）先生，新人中間的赫胥黎（Aldous Huxley）先生，戰後美國的劉易士（Sinclair Lewis）先生和派索斯（dos Passos）先生，雖然對於他們所需要的未必有把握，但他們把握得定的一件事便是現在這樣子是不行的。無論在詩歌、小說或哲學方面，那唯一有效的文字不是失望之情，便是反抗之聲；恰如十八世紀的法蘭西，唯有那種反對現行秩序的文

學，纔能予人心以深刻的印象。五十年前，卓著的政治家是受到一致的尊敬的；如今他就有見疑於衆人的危險。我們知道維多利亞時代（Victorian）的信念已在腐潰。各種哲學與激情相競爭，要取此信念而代之。但今日無論何處概沒有那種勸人另擇一個信仰對象的寧靜性或自信心。

西方的生活方式正在冶爐裏熔化。科學，不論其爲物理學或生物學，已經融解於形而上學；而且在另一方面，假使像在愛丁頓（Eddington）與詹恩斯（Jeans）手裏，科學已不自知地成爲反動的手段，牠便好像毫無宗旨，可說只是表示着無所不在的價值的紛亂狀況。牠雖能提供物質的享受，牠似乎不能發現精神上滿足的公式。一部分也可說是由於這種根本上的懷疑，所以那古老的東方——夙昔那樣默然順從西方的霸權的——如今便對於那些企圖保持這種訓政狀態的人們，發出斷然的挑戰。在十九世紀中，我們能够支配印度與中國，因爲那時我們自信是文明的傳播者。如今，當他們起來對我們的使命挑戰的時候，我們就無詞可答，唯有囂張地和模稜地堅持着我們有力量使他們帖然就範，聽憑我們擄取。遠東悲劇裏不很平常的一幕便是日本，牠本該來做西方與東方間溝通的橋梁，但牠似乎未嘗從維多利亞時代的經驗中有所領悟，而只學得了卑鄙的經濟帝國主義。牠已從倫敦與柏林，巴黎與紐約那裏尋到了能效的祕密。但牠似乎沒有什麼偉大的目標，以發揮這種能效。

知識階級對於新的行爲準則之追求，又無以異於法蘭西舊朝的末葉。反對這種追求的人

們，視這種追求爲自召紛亂，恰如曩昔柏克(Burke)一輩人的反動一樣。今日反動派對於實地試驗的要求所作的答覆，同樣是堅持着一種已經死去的傳統。他們對於追求新價值的欲望，同樣是怒形於色，認爲要懷疑到國家的根本上是危險的。約略一世紀以前宗教猶能以來世幸福補償今世不幸的話來安慰大眾；但時至今日，科學的發現已經熄滅了天堂之明光，而須即時即地得到解放。一世紀以前——不管卡萊爾(Carlyle)等人如何警告——大家從新的工業力量裏看到了得救的希望；如今，不管工業力量有怎樣巨大的利益，很明白，那種以純粹物質的力量來支配自然，使之適應我們的宗旨，如果離開了原則，而又無明白的目的，自是毫無意義。

我們各種標準之不能令人滿意的性質，可說在工業關係方面表現得最明白。個人主義的得勢，資產社會的勝利，差不多都是得不償失的。牠已經以驚人巧妙的方式，昭示我們以生產技術的祕密，但並未昭示我們以關於分配的公道問題的端倪。現代生產的歷史未始不可以被視爲各國政府狂亂地剝肉補瘡，竭力設法務使經濟力量的所有者在社會隄岸上鑿開的漏洞可以填塞起來。百年前托克維爾(Toqueville)所作的嚴重的預言，現在已經大大的應驗了。他寫道，

(註四)『不僅那輩富人們自身間沒有鞏固的團結，而且他們與窮人們也沒有真實的連繫。他們的相對地位並非永久不易的；他們常常因爲利害而結合或者分離。做工的人通常是依賴於主人，但並非依賴於任何一定的主人；工人與主人只在工廠裏見面，出了工廠就陌不相識；即使他們在某一點上互相接觸，但在其他各點上就離開很遠了。製造家除掉要求工人的勞力以外，別

無所求；工人除掉希望製造家發給工資以外，別無希冀。他們雙方並無保護或擁戴的義務；也沒有習慣或責任把他們永遠結連在一起……工人與主人間常有關係，而無真實的協力合作。」

以上所述乃是一種工業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因為這種工業制度的根本信仰，認為單是私人利益的衝突，便可以產生一個秩序良好的共和國。現代的商人對於爲他工作的人們，全然沒有什麼義務觀念；他確信既然他自己能够獲利，他的種種習慣便是正當的；所以任何批判評議，假如攻擊了該制度的根本，他就憤怒或詫異起來了。他並無真正的國家意識。他或則視國家爲可使他的利潤得到最大安全的一種組織——一種視國家爲純粹警察性質的概念；或則，當國家對於他提出的條件不得不稍爲悖逆的時候，他便堅稱國家這種家長主義的干涉是破壞了公民責任的基礎。在美國，他的政治活動的紀錄是令人扼腕的；美國商人確實降低了立法機關的地位，把牠當做了滿足他的貪慾的一種曖昧的工具。市政府和州政府都變成了那些腐化不堪，毫無原則的集團角逐爭奪的贓物。英國之發展爲一個社會服務的國家乃所以防備失勢階級的反抗；但至少自從大戰以後，那些較老的政黨之間，主義上已沒有明白的區分。牠們無非代表商人們企圖在個人主義的迅速衰落中盡力掙扎而已。無論牠們自稱有什麼深深的差異，但一旦遇到了勞工黨的嚴重挑戰，牠們的黨魁便認爲團結沒有什麼困難。

觀察者將不難看出晚近三十年間演進的經過，可以表明那些商人對於那個給他們以利益的制度，已經顯然失卻了信心。他們起初對於放任主義具有充分的信心。柯布登（Cobden）和勃

刺特 (Bright)、西尼爾 (Nassau Senior)、開恩斯 (Cairnes) 與法西特 (Fawcett) 都是宣播這一種福音的：他們警告國家說是爲了牠自己的福利起見，應該袖手不管工業方面的事情。在美國所教人的也是這同樣的學說，而且更加流行；若謂俾斯麥 (Bismarck) 把干涉主義的政策推行於德國，這與其說是他覺得這些政策本身是公正的，毋寧說是他覺得這是對付社會主義者的最好方法。然而自由放任的結果是太可怕了，連牠自己的擁護者也不敢贊同起來。很明顯的，雖在放任主義極盛的時候，所謂締結契約的自由，在締約雙方勢力不相等和個人交涉的情形下，這種自由也是毫無意義的。便是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如格林 (T. H. Green)，也感觸到社會的不幸的現象，而提出了一種積極國家的理論大綱，在這種國家裏，政府是採取干涉政策的，雖不企圖搖動舊社會秩序的基礎，但至少設法消弭善良生活所受的障礙。當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替之際，基於公衆利益上的需要，所謂一切人等都是他們自己福利的最好裁判人這個學說已被拋棄，而易之以另一種學說，把不以個人選擇爲依歸的行動範圍，規定了下來，而且擴充了不少。凡最低工資，工作時間限制，衛生設備條例，失業保障，義務教育，婦孺福利，住宅與公用事業，這都是表明這種大不相同的新風氣的。

這些新設施，其導源於平等學說者少，而是起因於人們有這一種要求，想削減那些由肆無阻礙的工業主義所引起的惡劣結果。牠們並未搖動那個根本理論——即經濟權力須操於私人之手。牠們乃是資本主義體系，遇到了反對牠那些較顯明的結果的呼聲，而不得不採取的讓步。

在那種情形下，牠們自是表示失卻了早期維多利亞時代自信能以個人企業予人滿足的那種樂觀的信念。就原則上說來，這類讓步是沒有止境的。而且國家的選舉權愈趨普及，各政黨愈不免允許做這類讓步，以冀獲得貧民的投票。大戰以後，英國賦稅的高度，實爲格蘭斯頓（Gladstone）時代所意想不到的。財務大臣活像一位不得已而爲之的綠林豪客，提出劫富濟貧的口號，同時向富人們再三說明，這樣可使各項財產權利得到保障。至於那些富人們，特別受了俄羅斯大革命的影響，非常惴惴於自身的安全，所以對於這種在他們衷心認爲大舉劫掠的辦法，也覺得未始不是得計了。

因此，像在法國革命前舊政體的最後階段中的貴族階段一樣，資產階級這種自信心的喪失，跟着便是那些被壓迫階級的福利的確實增加。但因爲每一次的讓步，其始都遭到強烈的反對，所以這種讓步的造成，似乎並非承認這一種權利的給與是正當的，而是慫於那些享受這權利的人們之力量，不得已而出於屈服。在這點上，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又給我們以觸目的對照。假如特殊權利的撤消提早三十年，那末取消舊制度的不平等，就不致於見得是被克服的結果了。唯其如此，所以每一次讓步只引起了許多的新要求。在伏特爾（Voltaire）與孟德斯鳩（Montesquieu）所認爲慷慨寬大者，在馬拉（Marat）與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卻視爲保守主義了。假如胡佛總統（President Hoover）在一九二八年成立了一種失業保險的制度，那末隨後數年間人家看來便是對於貿易循環盛衰之變的一種賢明預防；到了當前有千萬人失業纔成立

這個制度，則不僅得不到人家的感激，反而使人憤慨於牠的沒有政治手腕的延遲。一言以蔽之，資本主義的不能糾正牠自己的謬誤，具有兩大效果，其一係使牠所有一切預防方面的努力見得是倉皇失措，吝嗇不堪；其二則使牠的批評者認為他們的理由是比他們所想像的更為強有力。因為資本主義者在心驚膽戰之餘，已經把日前堅決宣稱他們所不能辦的那些事情都答應了他們。

這樣一來，在許多國家中，一輩比較溫和的改良者就上了臺。第一屆任期中的威爾遜總統 (President Wilson)，一九〇六年的自由黨政府，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九年的工黨政府，其所代表者無非是企圖在一個將死的舊制度與一個將生的新制度間，發現些折衷的辦法。他們用盡了那些舊的姿勢；他們也不大顧到那些舊的對象。他們加添了種種讓與，他們對於舊制度的種種特有的罪惡，加多了預防方法；但他們像突哥 (Turgo) 與芮克 (Necker) 一樣，不敢認真規劃一個在原則上與舊制度的基礎分離的新平衡局面。

他們雖如此怵怵覷覷，然而他們的政敵都已經覺得太過分了。他們的政策的代價很高，而且將來需費更多，至少在原則上，這種費用是很難加以限制的。如果國家教育制度是令人滿意的話，那末那些以自己勞力教育兒童的人們就有覬覦之心。假如失業保險的水平線代表一種可以過得去的生活程度，那末那些自食其力的人們將因此要求更高的工資。一種社會改良的政策在貿易澎湃的時期不會引起難問題；因為這時候可以提出讓步而不致變更那些主宰生產機器的

人們的生活方式。但當貿易衰落的時期，而採取所費不貲的社會改良政策，就要使該階級發生各種嚴重的問題了。資本便要趕到國外去找投資機會。資本的累積便要遇到妨害。賦稅便要增重，使舊日個人開支的標準難以維持。同時，生活競爭的人數加多了，但市場的銳減卻早已打破了不少飯碗。故當一個社會已達到收入漸減的時期，社會改良就變成了一種抑富濟貧的平等化的辦法。經濟節約的聲浪於是發作了。這表明各項財產權利——意即不平等的保持——是在危險之中。到了此時，改良家就要被趕走，頑強的反動派便要代之而起。

但他們代之而起的這個時期，乃是一個非常棘手時期。這時一般大衆料定有繼續不斷的讓與利權可以得到，而養成了種種習慣。大衆沒有預備這些利權將遭巨大的修改，更沒有料到牠們將遭一筆勾消的。若在一個代議制的民主國家裏，大衆的力量是與富人們相對抗的，那裏行使裁減節約的政策，便好像是故意把天平秤撥過去，叫窮人們吃虧。這政策在危機緊急之際，或許暫時可以奏效；但牠不能一往順利，成爲一種永久的政策。牠之能被大家接受，有待於明白的證明，證明這政策乃一時權宜之計，而爲將來進一步寬大的先聲。如果不然，牠就立刻要遭受深切的恨惡。改良家自能指出牠所要求的種種犧牲，沒有顧到分配上公平的原則。這些犧牲無非表示應爲不公平之故而保持不公平罷了。改良家們能够毫不費力地表明這些犧牲怎樣地重累大衆，他們又能够激起大衆們憤恨疾視這些犧牲。凡是一個反動政府，若欲長時期的反動下去，除卻把代議政治的正統原則廢止以外，別無辦法可取。因爲如果不廢止，該政府對

於牠各項方針欲求順利進行時必須取得的大衆繼續援助，是一點也沒有把握。牠必須不顧輿論，以武力來統治；既以武力統治，牠就不能冒險去受一次民衆的宣判。牠的生命的法則只是牠自己的意志，牠又須使國家的政體可以符合爲牠勝利所必需的各項條件。在長期間，這種做法的代價便是革命。法國與俄國的歷史便是如此；現代意大利的主要歷史亦然如此，雖其情形有些錯綜不同，但這是無關宏旨的。我們殊無良好理由說這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條公例。

而且還有一種特殊理由使上述這條公例在我們現代具有特別的勢力。現時代的中心事實便是國際間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每一民族的生活程度繫於牠對國外做生意能力的高下。但因爲每個國家莫不設法取得自給自足，商貨的流通於是處處受到了阻礙。我們可說是處在進退維谷之中。經濟國家主義把世界繁榮所繫的商貨與勞役之交換流通毀滅了，一般生活程度因之不能抬頭。另一方面，自由貿易的範圍愈廣，則比較先進的工業國家，其生活程度較高，就愈難與擁有大量便宜勞工的比較落後的國家相競爭了。蘭開夏 (Lancashire) 的棉織廠家無法與日本廠家競爭，便因爲兩國的勞動成本是太相懸殊了。結果是對於太相懸殊的情形發生了抗議，而在長時期，必然要發生經濟戰爭。國家資本主義利用了國家的機構來爭取牠們生活程度所依賴的市場，由此而有帝國主義對於落後民族的擄取。但這到後來又使互相競爭的各帝國主義發生衝突，而且必然不可避免地，使被壓迫各民族裏面形成一種國家主義的前途。那些苛待被壓迫民

族的土耳其與西班牙各帝國的歷史，同大體上善視被壓迫民族的英、美帝國的歷史，在這方面是並無二致的。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那種高度的現代生產率需要一種繼續不斷的市場的拓展，這便產生了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跟着又產生了一種新的國家主義，後者立刻組成一個保護政策系統，使牠自己的資本家的市場不致受到外國的侵略（註五）。

我們應付進退兩難的情境，所能採取的唯一辦法，從來不外是去逃避牠的必然性。因為在一個世界中，有若干依靠市場生活的民族國家存在，這些國家自必武裝起來，庶使市場不致失去；假如牠們遭受了威脅，牠們就得出於一戰。但我們這些曾經滄桑，牢記着戰爭代價的人們，自必明白戰爭的發作是與文明的維持互不相容的。世界大戰就是普遍的革命，那種情勢下包含的騷擾與無政府狀態可使人生體面爲之蕩然。因此，我們爲要逃避這種兩難，便被迫去尋出一個國際社會的方式。

國際社會又牽涉些什麼呢？這第一要取消那主權的民族國家，並將在現代世界中具有國際意義的一切經濟機能，如貨幣、關稅、移民、國外投資、和勞動狀況，盡歸於國際的管理之下。這一種國際體系，已見其朕兆於國際聯盟及其附屬各機關。不過無論何人，試考國際聯盟最初十年的歷史，總不免感覺國際聯盟所遭各種特殊權益的危害之大，有非牠所能勝利克服者。一切偏見與無知的力量，俱受各種特殊權益的驅使，而使國聯的目的難以達到；要使其目的得到實現，便需要歷史上空前鉅大的理智的一番調整。一個國際社會首須有一種國際意識。